

許燦輝 主編

中國語言文字研究 輯刊

花木蘭
文化出版社
出版

三 編 第十五冊

清代訓詁理論之發展 及其在現代之轉型(中)

鐘明彥 著

中國語言文字研究輯刊

三 編

許 鈺 輝 主編

第 15 冊

清代訓詁理論之發展
及其在現代之轉型（中）

鐘 明 彥 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清代訓詁理論之發展及其在現代之轉型（中）／鐘明彥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2〔民 101〕

目 4+222 面；21×29.7 公分

（中國語言文字研究輯刊 三編；第 15 冊）

ISBN：978-986-322-060-2（精裝）

1. 訓詁學 2. 清代

802.08

101015996

ISBN-978-986-322-060-2



中國語言文字研究輯刊

三 編 第十五冊

ISBN：978-986-322-060-2

清代訓詁理論之發展及其在現代之轉型（中）

作 者 鐘明彥

主 編 許鈺輝

總 編 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2 年 9 月

定 價 三編 18 冊（精裝）新台幣 40,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清代訓詁理論之發展 及其在現代之轉型（中）

鐘明彥 著



目

次

上 冊

上編 清代訓詁理論之發展	1
第一章 緒 論	3
第二章 清代訓詁學發展之歷史背景	13
第一節 考據學興起之原因	14
一、梁啓超之說	16
二、錢穆及余英時之說	27
三、眾說檢討	35
第二節 清代訓詁學發展概述	43
第三節 清代訓詁學成就概述	67
第三章 清代訓詁理論之先導——顧炎武	91
第一節 學術體系	92
一、爲學宗旨	92
二、爲學途徑	94
第二節 治學方法與訓詁運用	100
一、鈔書與札記	102
二、異文與校讎	103
三、輯纂與歸納	109
四、異聞與考證	114

五、經學與小學	121
第四章 清代訓詁理論之奠基——戴震	133
第一節 學術體系	133
一、爲學宗旨	133
二、爲學途徑	151
第二節 治學方法與訓詁運用	168
一、校讎	168
二、訓詁定義	171
三、文字與聲韻	175
四、名物與度數	176
五、訓詁理論	177
六、其他	185
中 冊	
第五章 清代訓詁理論之深化——王氏父子	191
第一節 學術體系	192
一、爲學宗旨	192
二、爲學途徑	198
第二節 治學方法與訓詁運用	202
一、研究精神	203
二、訓詁理論	209
三、文字與聲韻	261
四、校讎	268
五、其他	273
附錄：東原、朱子論治學有合語錄	277
第六章 清代訓詁理論之新猷——章太炎	293
第一節 學術體系	293
一、爲學宗旨	293
二、爲學途徑	306
第二節 治學方法與訓詁運用	338
一、語原研究	338
二、其他	391

下 冊

下編 清代訓詁理論在現代之轉型	413
第七章 緒 說	415
第八章 聯綿詞研究	429
第一節 現代聯綿詞定義	430
第二節 聯綿詞理據溯源	436
一、張有《復古編》	438
二、楊慎《古音駢字》	442
三、朱謀埠《駢雅》	446
四、方以智《通雅》	450
五、王國維〈古文學中聯綿字之研究（發題）〉	463
第三節 聯綿詞認知之商榷	473
一、定義	473
二、聯綿詞成因略商	483
三、分訓與字面爲訓之限度	492
第九章 反訓研究	507
第一節 古代反訓研究論析	507
第二節 現代反訓研究論析	529
第三節 反訓研究商榷	549
一、反訓舊說之定位	550
二、「反義爲訓」之可能	555
附錄：現代學者所論反訓定義與成因資料	560
第十章 同源詞研究	577
第一節 研究概略	577
一、沈兼士	580
二、王力	584
三、王寧、黃易青、孟蓬生	587
第二節 研究商榷	598
一、前說指疑	598
二、研究芻議	607
第十一章 結 論	613
附錄：本文主要歷史人物生卒年表	617
引用書目	623

第五章 清代訓詁理論之深化 ——王氏父子

王氏父子二人之學術，論者向不區別，本文亦不例外，蓋伯申之學乃克紹箕裘，而其一生著作大抵亦不離石臞之引導也，在《經義述聞》、《經傳釋詞》中，伯申自敘曰：

引之過庭之日，謹錄所聞於大人者以爲圭臬，日積月累，遂成卷帙。既又由大人之說觸類推之，而見古人之詁訓有後人所未能發明者，亦必有必當補正者，其字之假借，有必當改讀者。不揆愚陋，輒取一隅之見附於卷中，命曰《經義述聞》，以志義方之訓。（〈經義述聞序〉）

引之自庚戌歲入都侍大人質問經義，始取《尚書》二十八篇紬繹之，而見其詞之發句、助句者，昔人以實義釋之，往往詁籀爲病，竊嘗私爲之說而未敢定也。及聞大人論《毛詩》「終風且暴」，《禮記》「此若義也」諸條，發明意旨，渙若冰釋，益復得所遵循，奉爲稽式，乃遂引而伸之，以盡其義類，自九經三傳及周秦西漢之書，凡助語之文，遍爲搜討，分字編次，以爲《經傳釋詞》十卷。（〈經傳釋詞序〉）

此二書乃伯申著述之代表，從中可以得知，伯申之學不僅在操作上是石臞之發

明引申，在態度上亦完全奉持石臞爲圭臬者。龔自珍曾轉述伯申之語：

又聞之公〔伯申〕曰：「吾之學未嘗外求師，本於吾父之訓。」先是兵備公〔石臞〕校定晚周諸子、太史公書，一時言小學者宗之。公所著書三十二卷，謂之《經義述聞》。「述聞」者，乃述所聞於兵備公也。（〈工部尚書高郵王文簡公墓表銘〉，《王氏六葉傳狀碑誌集》，卷一，《高郵王氏遺書》，頁13）

蓋亦實情。甚且如陳鴻森先生所考證：

今考王氏父子事歷，知其時王念孫休致在家，專意於學，壹以著述爲事。由其與諸友往來書札，可知《述聞》三刻本較二刻本所增諸條，其實多出王念孫之手。而1930年代，傅斯年先生曾購得王念孫《呂氏春秋雜誌》稿本，以校《讀書雜誌》，今本王引之呂書案語十條，其中七條稿本則爲王念孫所校。此實物證據顯示，王念孫蓋頗以己說託名王引之。今驗《述聞》初刻之本，已可考見其跡。（〈阮元刊刻《古韻二十一部》相關故實辨正——兼論《經義述聞》作者疑案〉）〔註1〕

則二王之間更無分辨了。因此即便其中容有些微差異，在整體治學結構中，視之爲一，亦可不爲無由。

第一節 學術體系

一、爲學宗旨

王氏父子與東原雖然同朝，並且石臞又是東原門下，然則質實而言，二者之學術理念實不相同。前面曾經提及，東原重視義理一事，其實是不爲考據學派所認同的，以是儘管有洪榜、段玉裁等人爲之申辯，不可否認地，東原的《疏證》確實成爲絕響。《疏證》乃東原視爲「不得不作」的生平最大著述，而其二大高弟，所謂段王之學，卻一路專在文字訓詁。二相比較下，果然如朱笥河所

〔註1〕該文本發表於第三屆國際暨第八屆清代學術會議，會後陳師鴻森幾度修訂，本文所據爲陳師2004年2月16日修訂稿。承陳師特意寄贈，實不勝感激，謹此說明，並藉此聊表謝忱。

謂「戴氏所可傳者不在此」？〔註2〕王氏所傳既不在此，是核心之相異，而體系自將隨之而異構。具體而言，本文以爲東原大抵仍是朱子一路，漢宋兼采；而王氏則已純然專於考據家數了。

自然本文並沒有忽略晚期的東原對朱子不無斥責，不過應該注意的是，那些斥責多出自《疏證》，其中所涉及的純是義理內部的認知。至於重讀書、談考據以通經聞道的治學進程卻是頗爲一致的。如果檢視二者言論，不難發現二者不僅意見一致，甚至在文字、譬喻上亦頗見雷同，在此且略舉其要者以窺見一般：〔註3〕

（一）聞道

讀書將以求道，不然，讀作何用？今人不去這上理會道理，皆以涉獵該博爲能，所以有道學、俗學之別。（《性理大全書·學十一·讀書法一》，卷五十三）

看文字須是切己，則自體認得出，今人講明制度名器，皆是當然，非不是學，但是於自己身上大處卻不曾會，何貴於學。（《朱子讀書法》，卷四）

明彥按：參見東原〈答鄭丈用牧書〉、〈鉤沉序〉等。蓋東原乃堅持爲學必守乎聞道之志者。

（二）主人奴僕之喻

聖經字若箇主人，解者猶若奴僕。今人不識主人，且因奴僕通名方識得主人，畢竟不如經字也。（《性理大全書·學十二·讀書法二》，卷五十四）

明彥按：參見段玉裁〈戴東原集序〉。此與東原「轎中人」、「轎夫」之喻如出一轍。

（三）考據以通經

學者觀書，先須讀得正文，記得注解，成誦精熟。註中訓釋文意、事物、名件，發明經旨相穿紐處，一一認得，如自己做出來底一

〔註2〕洪榜語，見其〈戴先生行狀〉。

〔註3〕其詳者，更見本章附錄。

般，方能玩味，反覆向上有通透處。若不如此，只是虛設議論，如舉業一般，非爲己之學也。曾見有人說《詩》，問〈關雎〉篇，於其訓詁名物全未曉，便說「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某因說與他道：「公而今說《詩》只消這八字，更添『思無邪』三字，共成十一字，便是一部《毛詩》了，其他三百篇皆成渣滓矣。」因憶頃年汪端明說沈元用問和靖：「伊川《易傳》何處是切要？」尹云：「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此是切要處。」後舉似李先生，先生曰：「尹說得好，然須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方始說得此話，若學者未曾子細理會，便與他如此說，卻是誤他。」予聞之悚然，始知前日空言，無實不濟事，自此讀書益加詳細。（《朱子讀書法》，卷一）

明彥按：參見東原〈與是仲明論學書〉、章學誠〈與族孫汝楠論學書〉等。此明通經爲聞道之必經，而通經必根柢於小學度數等考據之學，蓋與東原所謂「識字」之義不有二致。

（四）鑿空

讀書之法無他，唯是篤志虛心，反復詳玩爲有功耳。近見學者多是卒然穿鑿，便爲定論，或即信所傳聞，不復稽考，所以日誦聖賢之書而不識聖賢之意，其所誦說，只是據自家見識杜撰成耳。（《性理大全書·學十一·讀書法一》，卷五十三）

明彥按：參見東原〈鉤沉序〉。東原乃深斥鑿空並以「緣詞生訓」、「守訛傳繆」爲其弊者。

（五）儒雜佛老

世變俗衰，士不知學，挾冊讀書者既不過誇多鬥靡以爲利祿之計。其有意於爲己者，又直以爲可以取足於心，而無俟於他求也。是以墮於佛老虛空之邪見，而於義理之正、法度之詳，有不察焉。（《讀子讀書法》，卷一）

明彥按：參見東原《疏證》、〈答彭進士紹升書〉、段玉裁〈戴東原生生年譜〉等。東原屢斥之儒學雜糅佛老者，朱子已深知矣。

僅此五項，實已概括東原治學之特徵，所謂「由字以通其詞，由詞以通其道」之考據進程，在朱子身上已具其粗胚，所不同者，在這個理路中，東原稍側考據，而朱子更重聞道耳。

東原與朱子的異同，頗令人嗅出時代潮流的移轉。事實上，在乾嘉時期尚堅守聞道之志的東原本是一個異數，環繞在東原周遭的，已然是一片純考據的氛圍。如段玉裁《戴東原集·序》：

蓋其興起者盛矣，稱先生〔東原〕者，皆謂考覈超於前古。始玉裁聞先生之緒論矣，其言曰：「有義理之學，有文章之學，有考覈之學；義理者，文章、考覈之源也。熟乎義理，而後能考覈、能文章。」玉裁竊以謂義理、文章未有不由考覈而得者。……。先生之治經，凡故訓、音聲、算術、天文、地理、制度、名物、人事之善惡是非，以及陰陽氣化，道德性命，莫不究乎其實。蓋由考覈以通乎性與天道。既通乎性與天道矣，而考覈益精、文章益盛。（《戴東原集》）

這一段論述，懋堂明是在東原「義理者，文章、考覈之源」的架構下特別又強化考覈的地位。不論如胡適所以爲之解人不易得，〔註4〕抑或余英時所說，懋堂乃有意在考證學家面前迴護東原者，〔註5〕皆表示懋堂，或其所處的時代背景，是考覈、義理分流而特重考覈者。〔註6〕

〔註4〕 胡適謂：「戴震明說義理爲考核文章之源，段玉裁既親聞這話，卻又以爲考核是義理、文章之源，這可見得一解人真非容易的事。」（《戴東原》，頁1045）

〔註5〕 參見《論戴震》，頁140～142。

〔註6〕 依錢穆所舉例證，懋堂〈娛親雅言序〉之言曰：「抑余又以爲考覈者，學問之全體。學者所以學爲人也，故考覈在身心性命、倫理族類之間，而以讀書之考覈輔之。今之言學者，身心倫理不之務，謂宋之理學不足言，謂漢之氣節不足尚，別爲異說，簧鼓後生，此又吾輩所當大爲之防者。然則余之所望於久能者，勿以此自隘，有志於考覈之大而已矣。」（段玉裁，《經韻樓集》，卷八）其以爲懋堂在理念上大抵仍是漢宋兼采者，宜可信也。（參見《三百年》，頁319～320）然則儘管有此信念，懋堂窮其一生，仍未能在義理上有所窺探，故其晚年乃有深悔：「歸里而後，人事紛糅，所讀之書又喜言訓故考核，尋其枝葉，略其本根，老大無成，追悔已晚。」（〈博陵尹師所賜朱子小學恭跋〉，《經韻樓集》，卷八）這種現象或者呈現出考覈之無涯，致懋堂皓首霜鬢，仍未能通乎義理；或者表示在懋堂心中，考覈之

又如洪榜〈上笥河朱先生書〉：

頃承面諭，以狀中所載〈答彭進士書〉可不必載，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何圖更於程、朱之外復有論說乎？戴氏所可傳者不在此。榜聞命唯唯，惕於尊重，不敢有辭。退念閣下今爲學者宗，非漫云爾者，其指大略有三：其一謂程朱大賢，立身制行卓絕，其所立說，不得復有異同，疑於緣隙奮筆加以釀嘲，奪彼與此。其一謂經生貴有家法，漢學自漢，宋學自宋，今既詳度數，精訓故，乃不可復涉及性命之旨，反述所短以掩所長。其一或謂儒生可勉而爲，聖賢不可學而至，以彼矻矻稽古守殘，謂是淵淵聞道知德，曾無溢美，必有過辭。（《戴震全書》，冊七，頁139）

這段議論，大抵呈現了朱筠的態度。^{〔註7〕}而「爲學者宗」的朱筠，可以在這些理由下獲得認同，刪去東原行狀中的義理成份，自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乾嘉漢學家的一般理念。洪榜所述三項已頗爲明確，從中自是可以見出漢、宋之間的壁壘分明，而本文在此更要指出的是，這種區別竟也引起學術目的的異趨，將聞道之志歸諸宋學，而漢學只宜趨向稽古。是東原考據而通經，通經而聞道的串聯歷程因而被易爲並聯，甚且互不相通的兩個範疇矣。而這一點，即使是維護東原的洪榜也不例外（或是不敢違拗），故其結論仍要透過將東原之義理歸入考據方能獲得肯定：

夫戴氏論性道，莫備於其論孟子之書，而所以名其書者曰《孟子字義疏證》焉耳。然則，非言性命之旨也，訓故而已矣，度數而已矣。

（同上引）

這種風氣，是東原背後的真實樣貌，也是王氏父子置身的時代潮流。根據王氏

地位、緩急仍先於義理。要之，其結果是義理一事、聞道之志在其時已漸趨概念化，不復能落實矣。

〔註7〕余英時以爲洪榜此乃「揣測」之詞，「未必盡符朱筠的本意」。然則細究余氏所持理由，或者由於洪榜「退念」、「大略」等語彙的意味，以及堅信朱筠「袒漢蔑宋」之考據學家立場耳。如就書中舉證之效力來看，其「揣測」的程度恐怕更甚於洪榜也。（參見《論戴震》，頁117～121）因此相較於「頃承面諭」的洪榜而言，吾人殆無由過慮而輕疑之矣。

父子之自表，二人之學雖出自東原，在這一點上並不與時代有其異趨。

余自壯年，有志於鄭許之學，考文字、辨音聲，非唐以前書不敢讀也。（王念孫，〈群經識小序〉，《王石臞先生遺文》，卷二）

余與容甫交，垂四十年，以古學相砥礪。余爲訓詁文字聲音之學，而容甫討論經史。（王念孫，〈汪容甫述學敘〉，《王石臞先生遺文》，卷二）

引之受性禔昧，……。年二十一，應順天鄉試，不中式而歸，亟求《爾雅》、《說文》、《音學五書》讀之，乃知有所謂聲音、文字、訓詁者。越四年而復入都，以己所見質疑於大人前，大人則喜曰：「乃今可以傳吾學矣。」遂語以古韻二十一部之分合，《說文》諧聲之義例，《爾雅》、《方言》及漢代經師詁訓之本原。（王引之，〈經義述聞序〉）

此三者蓋出於石臞之言，前者自表志業，乃鄭許文字、音聲之學；次者則以容甫（汪中）之研經史相對於己身之治訓詁文字，是石臞乃專意攻治小學者可無疑，故後者所自表之「吾學」皆不外乎此。至其子伯申，則此意更明：

自珍爰述平日所聞於公〔伯申〕者，曰：「吾之學於百家未暇治，獨治經。吾治經，於大道不敢承，獨好小學。夫三代之語言與今之語言，如燕、越之相語也。吾治小學，吾爲之舌人焉，其大歸曰用小學說經、用小學校經而已矣。」（龔自珍，〈工部尚書高郵王文簡公墓表銘〉）

可知聞道一事對伯申而言，已然順理成章地置之於學術之外了。「大道不敢承」云云，或者隱約透露其中心態，蓋與洪榜所言朱筠之意：「聖賢不可學而至」者可以相應。〔註8〕

〔註8〕又錢穆《三百年》中曾引述懋堂〈與王石臞書〉之言：「今日之弊，在不當行政事，而尚剿說，漢學亦與河患同。然則理學不可不講，先生其有意乎？」（頁320）段、王同爲東原門下，二人相交甚深，是懋堂非不知王學者。此書婉言相詢石臞之有意與否，似隱含勸說之意也。而此種勸說，自然是將石臞定位在謹守漢學分際者耳。唯此書僅見錢穆引述，不見《經韻樓集》（含劉盼遂補編）及《昭代經師手簡》（初編、二編）收錄，在未確定來源前，不敢遽以爲證，姑置此參考。

二、爲學途徑

王氏父子二人在治學上的議論並不多面，亦不多見。大抵只在〈段若膺說文解字讀敘〉中可以看到石臞的一段表述：

吾友段氏若膺於古音之條理，察之精、剖之密，嘗爲《六書音均表》，立十七部以綜覈之，因是爲《說文解字讀》一書，形聲、讀若，一以十七部之遠近分合求之，而聲音之道大明。於許氏之說正義、借義，知其典要，觀其會通，而引經與今本異者，不以本字廢借字，不以借字易本字，揆諸經義，例以本書，有相合、無相害也，而訓詁之道大明。訓詁聲音明而小學明，小學明而經學明，蓋千七百年來無此作矣，則若膺之書之爲功也大矣。（註9）

這一段表述雖爲懋堂《說文解字讀》而作，衡之二王之學術表現卻也並無二致，宜非只爲應酬之語。在這段敘述中，石臞先分別陳述了聲音之道與訓詁之道，隨即會合二者，以爲造就小學可明之二大要素，而小學明又爲經學明之必須階段。大體看來，這個進程與東原「文字——語言——心志」或者「訓故——古經——理義」的進程不有或異，更以二人的師弟交誼來看，吾人可大膽地以爲石臞應即源出東原者。然而同則同矣，二人的志向畢竟有別，以是如仔細比對，亦可見出其間的異趨。

首先，在治學的目的上，東原「心志」、「理義」的一端，在石臞身上已直接排除，經學成了最終的目的；其次在訓故至通經的一面，如前章所述，東原的考據實際上包含了語言文字以及寄託在語言文字背後的知識本身，然而石臞則愈發強調小學的地位，令語言文字承載了絕大部份的考據責任。

表面上看來，這二個異點顯示二王格局的狹隘性，就前者而言，緣於聞道之志的擱置，使得治經本身成了最終目的。如依東原的標準來看，固是未能建立大本，只堪與其「輿隸」相往來耳。（註10）就後者而言，驗諸其實際的學

〔註9〕見王念孫，〈段若膺說文解字讀敘〉，《王石臞先生遺文》，卷二。又，據劉盼遂意，《說文解字讀》即《說文解字注》之前身也。見《高郵王氏父子年譜》，頁32。

〔註10〕章學誠〈書朱陸篇後〉：「凡載〔東原〕君所學，深通訓詁，究於名物制度，而得其所以然，將以明道也。時人方貴博雅考訂，……，以謂戴之絕詣在此，……。戴見時人之識如此，遂離奇其說曰：『余於訓詁、聲韻、天象、地理四者，如肩輿

術表現，卻也令人懷疑，這一個治經的理念恐怕仍只是其儒家身分下的一種制約、慣常性的宣稱，因為在其著作中，儒家的經典並不佔有更多的比例，反而是小學成了主體，而以之普遍施用於一切之周秦古籍。雖然不能確定二王對此狀態之自覺與否，具體的現象是，治經的目的在操作過程中被淡化了，而幾為一種「純理論性」的存在。於是吾人可以說，對王氏父子而言，解經（更精確地說，解釋古籍）的步驟，乃自校訂板本始，以至經義大明止。而自始至終，則端賴於小學之發用。是上引伯申之自稱述「用小學說經、用小學校經」者，亦宜如斯理解。在經的範疇模糊之後，小學儼然成為二王學術的真正核心。

質實而言，由校勘、小學二者以通經的進程，可說是半個東原，乃全然涵蓋在東原結構之中而略無異致，因此或可不必在此贅言複述。本文以為，此中更值得注意的，恐怕還在於潛藏在變化下的內在意義，此約略可以從兩個角度來看待。其一，就思想意義而言，這代表漢、宋分流的確立，而程朱思想在東原不獲認同，後繼無人下，正式退出漢學領域、退出主流。這一點，吾人可以從學術承傳的脈絡上來理解，在這個脈絡中，倘以東原做為中心，是其上乃遠承朱子、近接亭林；其下則開啓段氏、二王之學。如果在漢學的立場上看，自然可以發現考據思潮由復甦而至巔峰的一路發展。只是如此地理解其實是以漢、宋對立，分繫於二大陣營前提下的結果，如果將焦點置於這演變過程中的個人身上，其情況恐不如是。質實而言，朱子乃宋學中不廢考據之人；亭林雖以史學為主，卻仍具義理歸向；而東原則顯在考據陣營中獨標聞道之志者。雖然其中比例輕重略有不同，不可否認的，是此三人之整體主張固乃漢、宋兼備而不偏執一端者。本文以為這才是儒家思想的常態，以及完整的樣貌，所謂「尊德性」、「道問學」二者，該是「一體」之兩面、本末之配合，如余英時所謂：

和尊德性相對的，還有「道問學」的一方面，……。這本來是儒家的兩個輪子，從《大學》、《中庸》以來，就有這兩個輪子，不能分的。儒家傳統中還有其他的名詞和這兩個輪子相應的。比如說「博

之隸也。余所明道，則乘輿之大人也。當世號為通人，僅堪與余與隸通寒溫耳。』」（《文史通義·內篇》，頁275）

學」和「一貫」，或者「博」與「約」，或者「聞見之知」和「德性之知」，或者「居敬」和「窮理」，這些都是成套的，你不能把它割裂開來看。（《論戴震》，頁 348～349）〔註 11〕

以此檢視段王三人，懋堂固然義理上未見著力，然畢竟在理念上仍作此想，至王氏父子，則已然敬而遠之、不敢志此。本文以為這種堂而皇之的偏廢其實正透露著價值體系的徹底改易。換句話說，儒家的一貫體系，已如朱筠所主張的，正式地被劃分為「漢學自漢，宋學自宋」，這代表其價值體系的崩解。隨後在各自維護其理論的合理性、甚至地位正統的立場下，必然以其原有的信念為核心，又分別構成獨立的價值系統與治學目標。以宋學而言，性命之旨的體察、躬身實踐的人格，可能是致力的目標；對於漢學，也許訓故度數的博雅、實事求是的精神才是其推崇的典範。上引朱筠之意：「今既詳度數，精訓故，乃不可復涉及性命之旨，反述所短以揜所長。」可謂即此心態之呈現。在此二系統各自成形後，其間的壁壘只能更加分別，終至使得漢學純漢，宋學純宋，而東原所堅守著的一點義理理想也終將徹底排除。毋可諱言的，如此發展對儒學而言，自不令人樂見，而針對漢學，更不見得正面，因為儘管宋學可能涉入玄虛，然而純就理論而言，漢學專意「學文」，不免忘卻「行有餘力」之前提矣。

這種局面的形成，恐怕不能單純地以為是漢宋對立的結果，因為潛藏在對立背後的，是兩個涇渭分明的價值體系。須注意的是，這兩個體系是原有的一貫體系分裂後的結果，因此，這個現象背後更潛在的學術意義便有進一步探索的必要。在此，吾人可以方東樹之語做為切入點：

漢學家皆以高談性命，為便於空疏，無補經術，爭為實事求是之學，衍為篤論，萬口一舌，牢不可破。以愚論之，實事求是，莫如程朱。以其理信，而足可推行，不誤於民之興行。然雖則虛理，而乃實事矣。漢學諸人，言言有據，字字有考，只向紙上與古人爭訓詁形聲，傳注駁雜，援據群籍證佐，數百千條。反之身已心行，推之民人家

〔註 11〕 在此要稍加說明的是，余氏雖如此表述，然畢竟仍區別漢、宋為二系者，而本文則強調，這種「成套」是在一人、一家內部的相依、互存，而不是兩方各執一端的競爭或配合。